



第三屆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圓桌會議

報導：謝志斌博士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駐國內副研究員

為慶祝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十週年（1995-2005），回顧和反思漢語神學的發展歷程並展望其未來的走向，第三屆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圓桌會議於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九至二十三日在雲南昆明市郊撫仙湖旁舉行，有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等地的二十多位漢語基督教研究學者參加了會議研討。大會以「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十年：回顧和反思」為主題，下設四個分題。



一、回顧和前瞻：十年來的漢語神學

清華大學王曉朝教授發表的〈漢語基督教神學研究的特質、貢獻及其未來〉首先概括了漢語神學研究發展所呈現的三大特質：非教會性（或跨教派性）、人文性（或學術性）和跨文化性（對話性、開放性），並肯定了漢語神學研究對當代中國社會在促進學術界和民眾認識基督教等方面所做出的貢獻。他最後指出，漢語神學未來的研究需要突破和超越東西方之二分、教內外之差別以及全球性和本土性之對立等三方面因素，以實現新的跨越。中國人民大學李秋零教授發表的〈漢語神學的歷史反思〉則概括了十年來漢語神學發展取得的成果，着重論述「漢語神學」與「傳統」（包括中國文化和基督教神學傳統）的關係。他也提出了漢語神學研究視域的拓寬問題，促使漢語神學在作為「母語神學」的特殊性的同時呈現作為基督神學的普世性。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陳家富博士提交的論文〈兩種類型的辯證神學——兼論劉小楓的漢語神學構想〉，通過分析巴特（Karl Barth）與蒂利希（Paul Tillich）關於辯證神學的討論，來檢視劉小楓漢語基督神學構想中的問題，指出其「直面基督」的思想應修正為透過歷史文化的場境來直面基督，而這並不削弱他本來的重點。對於漢語神學類型的理解，浙江大學張新樟博士的論文〈神學如何影響社會——試論兩種漢語神學類型的融合〉則把當前的漢語神學理解為文化基督徒神學（強調個體信仰體驗）和教會教義學（教會倫理

型）兩類，而他把這兩者間的張力和結合根源於基督教歷史上的神秘主義與歷史主義、修行宗教和倫理宗教之間的抗衡。

二、「漢語」與「神學」

台灣中原大學曾慶豹教授在〈甚麼是漢語神學？〉一文中概括分析了漢語神學的六大基本論題（如拒絕以信仰負擔民族主義、反對將信仰作倫理道德工具等），指出必須以現代性問題意識來理解「漢語神學」的意義，並提出了一種與十字架神學相宜的漢語基督神學的設想。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教授發表的〈「漢語神學」之語言學定位的獨特價值〉強調「漢語神學」的語言學性質；這一定位植根於對基督教神學之「全然他者」和意義的「他異性」，而表現為神學資源進入公共話語（特別是人文學視野）的進路。

台灣神學院林鴻信教授的論文〈啟蒙的再思——漢語神學關注焦點建議〉指出若一味追求啟蒙而排斥宗教信仰，可能陷入反啟蒙的陷阱；而若藉由宗教信仰提供的深度反思，則可能幫助啟蒙得以健全發展。他建議漢語神學必須檢視理性的立足點、極限和使用理性者的極限。中山大學夏可君博士的論文〈禮物給予與漢語神學的可能性〉則從「禮物給予」的思想出發，探討基督禮物給予思想和漢語禮物饋贈思想之間的關係，挖掘漢語感通思想和基督教觸感神學之間可能的關係，從而提出了兩者之間的可能轉換及漢語神學的可能性問題。北京大學徐鳳林教授在〈東正教的「神化」觀的神學含義和根據〉一文中從東正教的拯救觀、神秘神學、能量學說和聖靈論考察了東正教的神化觀的內涵，指出了這一思想所透視出的神人關係對於漢語神學的生存體驗和「直面基督」問題有一定的啟發。



三、「漢語神學」與當代中國及其未來

香港中文大學溫偉耀教授在〈「漢語神學」與當代中國及其未來〉一文中認為，中國基督宗教具有多元性和變動性的特點；在這種語境中，漢語神學的發展應該考慮源自「全球化心態」的宗教取向、對全球化反動而出現的尋根文化取向以及承接「後現代」西方的宗教取

向等三方面取向相應提出的一些神學課題。中國人民大學何光滬教授的論文〈天主教社會教義與中國社會和教會——從《教會社會教義綱要》說起〉在中國大陸學界第一次全面介紹、分析天主教《教會社會教義綱要》。它提醒漢語學界、宗教界和廣大社會對當代普世天主教會的社會教義的關注，這將有助於彌合中國教會與世界教會，以至中國教會和全球社會的差距。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師寧教授的論文〈從漢語女性神學的建設看實證研究的意義〉指出，漢語神學的內容應包含具有現代意義上的神學形式（如女性神學）。她通過實證研究，分析了中國女性基督徒生存狀態與宗教體驗和宗教生活，而這些正是建立漢語女性神學的前提。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與人類學研究所黃劍波博士發表的〈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基督教〉描述了鄉村基督徒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所經歷的社會、文化和信仰上的衝擊及由此出現的新生活和信仰方式，從而展現城市化對中國基督教的影響和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謝志斌博士發表的〈確定與不確定的未來：中國基督教公共神學的可能性——兼論「漢語神學」實證性研究的問題意識〉，着重探討中國公共神學建設涉及的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的因素及其提出的策略和問題，並指出作為一個新的維度，漢語神學在實證性研究方面的努力方向。

四、「漢語神學」、《聖經》和普世基督教傳統

香港中文大學賴品超教授在〈漢語神學、《聖經》和普世基督教傳統〉一文中回顧了漢語神學與《聖經》研究的關係，指出過去的發展因缺乏與《聖經》研究的結合，而導致它在華人教會中的認受性成問題。他也指出漢語世界豐富的文化資源應可對普世的《聖經》研究做出獨特的貢獻。香港中文大學謝品然教授的論文〈漢語、《聖經》、神學——邁向一個批判的漢語公共《聖經》神學之建構〉提出在全球區域的公共處境中進行《聖經》文本的公共性理解或現代性解讀，以此探討漢語生活世界、《聖經》詮釋、公共神學三者之間的關係，尋求基督宗教信仰與漢語公共生活的關係和處境中的《聖經》詮釋。

世界信義宗聯會鍾志邦教授在〈《聖經》語言：國內漢語神學研究的缺環〉一文中分析了《聖經》研究（特別是《聖經》語言）在中國學界的基本情況（教學、研究、會議、出版等領域）和其中的不足之處，並進一步提出了

幾點促進《聖經》語言學習和研究的想法。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林子淳博士發表的論文〈《聖經》作為神學研究文本的問題意識——論漢語神學與普世基督教傳統的承傳與交流問題〉分析了《聖經》詮釋與基督教傳統的承傳和交流上的問題，檢視了現代基督教神學的多樣性發展與《聖經》研究的關係，指出漢語神學研究者處理《聖經》文本背後所涉及的問題意識。中國人民大學查常平博士在〈從《新約》的歷史邏輯審視漢語神學與《聖經》神學〉一文中指出，《新約》的歷史邏輯應屬於人文—社會學的《新約》學範疇，並建議目前漢語神學應對《新約》作為歷史文本的語言觀、時間觀和正義觀的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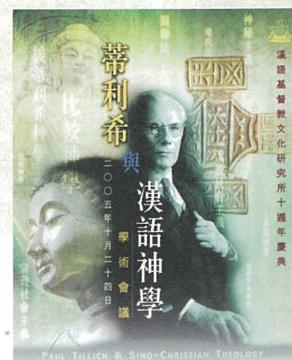
武漢大學趙林教授在〈基督教的普世化與本土化〉中從歷史的角度論述了基督教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普世化與本土化的過程及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並結合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歷程思考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分析了基督教在當代中國文化背景下面臨的挑戰。

跋、獻議與期望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總監楊熙楠先生在閉幕致詞中指出，圓桌會議的起始與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是一脈相承的，是次會議也秉承過往的優良傳統和帶來突破。與前兩屆會議相比，本屆在關注的焦點上以反思性和前瞻性為特性，在選題上除文史哲的傳統視角外，加上《聖經》研究和宗教社會學兩方面的內容，以求適應與跟進現時國內研究之動態，也為豐富和拓展漢語神學提出了新的問題和空間。另外，本屆會議還邀請漢語神學的一些年青學人參與，與前輩學人共同切磋協作，共創漢語神學的未來。■

蒂利希與漢語神學學術會議

蒂利希與漢語神學學術會議於十月二十四日在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會議廳舉行，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十一位研究蒂利希的專家在這次會議中發表了論文，其他與會者包括來自本地和國內的四十多位學者和學生。



會議於早上九時半開

始，上午的研討分為兩場。第一場的研究題目都與蒂利希的關聯法有關。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基督教文學碩士學生梁容女士探討課題為「蒂利希的文化神學的關聯法及其類型」，她區別了兩種類型的關聯法，進而考察了宗教與文化之關聯在不同的歷史處境中的自律、他律及神律三種類型。最後得出宗教本質與文化形式之間不是互相抵牾，而是相互關聯和內在

一致的觀點。接着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神學學部哲學碩士黃天生先生討論宗教與處境之關聯——從蒂利希到徐思 (David Tracy)。他從「關聯法之背景——從現代走向後現代」、「關聯法內之宗教理解——從信息走向經驗」、「關聯法之方法——從問與答走向批判詮釋」三個角度，分析了在當今背景下徐思對蒂利希關聯法的繼承和改造，嘗試為處境神學發展一個新模式。

第二場的題目皆探討蒂利希的政治神學思想。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神學學部哲學碩士李駿康先生主要討論蒂利希的宗教社會主義及其對當代中國的意義。他首先對蒂利希的政治思想進行了闡述，然後介紹其宗教社會主義思想，最後探討了蒂利希的宗教社會主義思想對當代中國的意義。李駿康認為通過神律使個體的自律以及個體文化功能從自我毀壞的孤立中得以解放，對中國構建一個民主、人權、公義和人性的社會有幫助。台灣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候選人莊信德先生則討論蒂利希本體論範式的「國家」概念對「民族國家」魔魅本質的批判。文章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述，第一方面從國家的起源與未來、國家的本質與表現、國家的規範與批判三個角度分析了蒂利希本體論範式的國家概念。另一方面，他也論述了蒂利希的國家概念對「民族國家」魔魅本質的批判。最終莊信德希望蒂利希的國家概念能為兩岸當前的困局提出一個建設性的神學規範。



會議在下午繼續進行了三場的研討，首先一場的兩位講者都從特定的角度審視蒂利希的神學思想。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神學學部哲學碩士候選人的王濤探討的是〈蒂利希愛觀的研究—現狀與評價〉，他首先概述了學界對於蒂利希愛觀研究的總體狀況，然後集中比較歐文 (Alexander C. Irwin) 和虞格仁 (Anders Nygren) 與蒂利希的愛觀。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陳家富博士則探討蒂利希對於神秘主義的吸納與批判，並其討論神秘主義時所體現的位格主義 (personalism) 傾向和其神學思想中「上帝之上的上帝」所體現的「非位格性的存有論」之間的張力，最後他更提出一個嘗試性的解決方案：這樣的上帝其實也可以是一三一論的上帝，由此可以將位格因素與「上帝之上的上帝」的絕對性相統一。

第四場的發言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葉菁華教授、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鄧紹光教授以及漢語基督教研究



所研究員林子淳博士。葉菁華探討的是〈蒂利希對現代性的理解與批判〉，嘗試整理和重構蒂利希對現代性的理解和批判。儘管蒂利希與法蘭克福學派有着某些相近之處，但葉菁華指出其兩點特色：一是以神律作為批判性和建構性的理想，這在蒂利希看來是現代性問題的終極根源。二是在社會理論分析中加入了神學盼望的原素，形成一種超越悲觀的神學社會理論學說。鄧紹光的論題是〈在蒂利希與海德格的有與無之間的思考〉，就兩人對存有(有)與非存有(無)的理解作對比性考察和探討。在他看來，蒂利希的辯証法不一定要按着黑格爾和伯麥 (Jacob Boehme) 的思想來詮釋，而可透過海德格爾後期的現象學來演繹。存有與非存有的辯証，在蒂利希那裏是上帝兩種不同的面向和作用，它們是相即不離的，由此可以說更接近海德格爾式的相互隸屬的關係。本場最後發言的林子淳博士，所探討的課題是〈蒂利希有必要採納嗣子論嗎？——一個聖經觀點的回應〉。他指出蒂利希並非認同歷史中某一種形式的嗣子論，而是為提出聖靈基督論而導致的，目的是要強調救贖的普遍性。但這卻無法整合十架和復活的關係，甚至連三一論的架構也有坍塌之虞。最後，林子淳嘗試指出，解決之道可能是要把道成肉身論之遍在性因素提升至與聖靈基督論等同，而關鍵正是現代教義學久違了的升天論述。

第五場的發言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賴品超教授以及信義宗神學院的區建銘教授。賴品超的發言題目是「文化研究、宗教研究與神學：一個後蒂利希的觀點」。賴品超認為文化研究、宗教研究與神學三者之間可以形成「一互惠之交流關係」，若宗教研究能對規範性問題更加開放，除可維持宗教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分別，更能克服由文化研究而來的對宗教的還原主義；宗教研究者也能對規範性問題和終極性問題採取更為開放的態度。對蒂利希來說，「宗教是文化的內涵而文化是宗教的形式」，兩者具有密切的一致性。區建銘教授的題目是「蒂利希與比較神學」，以蒂利希的「終極關懷」為宗教比較領域的一個宗教記號來切入比較神學。記號在解釋過程中，一方面由對象所確定，一方面又確定解釋者心中的一個觀念，即意解 (interpretant)。這一三元關係的解釋過程不僅是認知的過程，也是一種行動，同時又隱藏着價值。在各講者發言後，會議大約於當日下午六時半完滿結束。■

彭小瑜教授和李秋零教授分別獲頒徐光啟獎和艾香德獎



為促進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的基督教文化研究，推動漢語神學的發展，本所特設「徐光啟獎」頒予漢語基督教文化優秀論著；「艾香德獎」頒予基督教歷代思想經典優秀譯著。二者均設獎金人民幣五千元及紀念獎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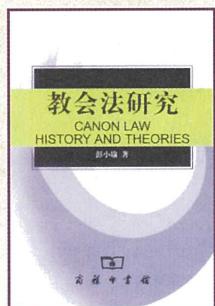
「道風學術獎」兩年評選一次。所有參與評選的著作只限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的基督教純學術書籍，不拘限於任何教派或教會宗派傳統，惟着重相關著作的知識性、學術性、文化性和思想性，對於一切從學科專業角度研究基督神學諸領域、基督教人文科學、宗教對談之學術成果均表歡迎。

本屆「道風學術獎評選委員會」已選出得獎作品，以下是獎項結果及得獎者的感言：

漢語基督教文化優秀論著：徐光啟獎

得獎者：彭小瑜教授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得獎著作：《教會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首先，為獲得「徐光啟獎」，我要感謝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和道風學術獎評選委員會各位教授的厚愛。在從事基督教學術研究的跋涉旅程上，同道和同人的支持，有時哪怕僅僅是隻言片語的同情和理解，也是足以讓人感到溫暖和慰藉的。教會法體系博大，術語和概念龐雜，涉及到多種語言，在我自己多年的學習過程中，曾經受到過北京大學、美國天主教大學和哈佛—燕京學社慷慨的經濟支持。但是我所要感謝的不僅是這些機構所給予的獎學金和研究經費，更要感謝的恐怕還是那裏的老師、同事和朋友們對我的耐心和信任，那份綿長的耐心使我得以在相當長的時段裏進行西方歷史和語言以及宗教思想和制度的全職研修，為後來專門從事中世紀教會法和教會歷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在擁有深厚科學和民主愛國傳統的北京大學，思想的開放和學術的自由也表現在重視對西方歷史和現狀的研究和教學上，基督教思想和文化自然是其中特別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此，我要感謝我在學校的同事和眾多的學生，感謝他們的興趣、理解、寬容和鼓勵。

也是在這樣一種寬鬆的氛圍當中，《教會法研究：歷史與理論》所涉及的一些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得到了充分的展開和討論。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社會和文化人對中世紀基督教的一些方面，甚至對基督教信仰本身，有過懷疑，提出過種種批評。其中有些批評是比較公允的，但是有不少是為偏見所左右的，而且還影響到歷史文化研究，使得一些西方學者對中世紀教會，對羅馬天主教會的制度和教義，做出不符合歷史真相的評價；而對中世紀和天主教會的歷史成就及其對西方社會的貢獻，他們則往往給予偏低的估計。或許由於我們對西方歷史和文化研究至今還比較薄弱，他們這些具有濃厚啟蒙運動色彩的觀點通過種種途徑還在影響着不少中國學者和讀者。所以在對教會法、教皇制度、宗教裁判所、修道精神和修道院制度等等問題的理解上，我們常常能夠發現不少誤解和成見。我希望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糾正這類誤解和成見，我也一直在為此努力着。為此，我也和不少的同事、前輩和同學們進行交流，聽到過贊同的聲音，也面對過不同的見解和反對的意見，所幸的是這一切都能夠在開放的討論中進行，能夠在微笑和懇談中進行，相信大家的學術見識也因此得到了長進。



得獎者彭小瑜教授(左)及評委會主席卓新平教授

由於歷史和文化的原因，基督教在國內只是少數人的信仰。即便如此，基督教的價值觀並不一定在國內就沒有影響主流社會的可能和必要，研究基督教學術和文化的意義也正在於此，不過研究的方法和側重點的確應該與西方學者有所不同。我個人的感覺是，教會歷史的研究應該特別注意避免說教，應該在實證研究和具體問題的研究上着力展開，在構建史實的基礎上進行教會史研究者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對話。胡貝特·耶丁(Hubert Jedin)在其主編的十卷本《教會史》(History of the Church)的序言裏，曾經試圖界定教會歷史研究和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在純粹事實的層面上，基督教學者和非基督教學者在方

法論上並無不同，都必須尊重事實；神意玄妙，一些讓教會難堪、讓信仰在世人眼中受辱的歷史事實，也都要到最後審判的時刻才顯現其真正意義，所以即使這些事實也不可能毀損信仰和教會的神聖性，更不必諱言。記得庫爾頓 (G.G. Coulton) 憤怒地批評過雅各·馬里坦 (Jacques Maritain) 對中世紀文化和天主教傳統的讚美，他部分的批駁證據出自中世紀法學家對格蘭西 (Gratian) 《教會法匯要》(Decretum) 的評注，是一些允許和肯定丈夫虐待妻子行為的法律意見。姑且不論庫爾頓的文本解讀是否精確。我相信，對基督教歷史和文化正面的總體評價是不會因為某些歷史的片段而改變的，其中有些本來就只是特定時代和社會的陋習，而非基督教信仰和制度的內涵，是會隨着時代的前進被揚棄的。

誠如托馬斯·默頓 (Thomas Merton) 所言，「孤寂不是與人隔絕」。「孤寂」是在排除從眾盲目心態的前提下對真理的孜孜追求和表達，是在上帝面前的謙卑，是對個人責任的承擔，而不是在他人面前的傲慢和自私。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促進基督教學術研究的事業讓人感佩至深，因為它是這樣一項孤寂和謙卑的事業。在感謝獲得「徐光啟獎」的同時，我希望我自己今後的學術研究也能在孤寂和謙卑之中稍許更進一步。■

彭小瑜

基督教歷代思想經典優秀譯著：艾香德獎

得獎者：李秋零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得獎譯作：康德 (Immanuel Kant) 著，李秋零譯，《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Vernunft)。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收到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通知，言稱我翻譯的《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一書榮膺「二〇〇五年第四屆艾香德獎」，委實有受寵若驚之感。「艾香德獎」設立迄今已曆四屆，我已連獲二屆（上一次是「第三屆艾香德獎」），對於提名者和評獎者的厚愛，我自然是十分感激的。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設立「艾香德獎」，旨在促進基督教學術思想著作的翻譯。有目共睹的是，近年來有大批的基督教學術思想著作被譯成了漢語，這既是中國基督教的幸事，亦是漢語學術的幸事。而在這些著作中，康德的《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無疑是最重大的著作之一。這位出身於敬虔派家庭而在啟蒙時代成長起來的思想家，以德國人特有的思辨系統地論



證了啟蒙運動的理性批判精神，但與法國啟蒙運動相比康德的高明之處在於，在他那裏理性同樣是理性批判的對象，理論理性被限制在經驗的限度之內，而實踐理性則以公設的方式保證了宗教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但正因為此，宗教也必須被限制在單純理性的限度之內。宗教既然是基於道德需要的公設，超出道德需要的部分也就是沒有必要的。在這種基本思想的指導下，康德在《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一書中對基督教作出了全面的梳理，涉及到原罪說、基督論、救贖論等基本教義，涉及到教會的組織和體制，涉及到種種聖事等。當然，康德對上帝信仰的道德哲學新論證還在康德的生年，亦即在十八世紀的最後十年，就成為深刻批判的對象。這種批判集中於康德一方面主張道德理性的自律，另一方面又主張至善如果不假定一個統治世界進程的上帝就顯得不能實現，這種張力為



評委會主席卓新平教授及得獎者李秋零教授(右)

不同的理解洞開了門戶，甚至對康德的道德神學的批判也很容易導向一種道德上的無神論。然而，康德把對上帝的信仰奠在道德情感的基礎上，加強了基督新教關於信仰相對於知識的獨立性的信念，宗教被理解為人的一種主要是實踐的事情，對基督教神學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施萊爾馬赫、費希特、黑格爾的神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康德出發的。而對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新教神學來說，康德的思想依然有一種頑強的影響。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諸位提名者和評獎者所青睞的，與其說是我提供了一個優秀的「譯本」，倒不如說是我翻譯了一部優秀的「著作」。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設立「艾香德獎」，其根本宗旨仍在於促進「漢語神學」的發展。作為神學大家族中的後來者，「漢語神學」在出現之前，基督神學已積聚起一個悠久而且豐厚的傳統。「漢語神學」在自身的建設中必須重視基督教的已有傳統。而翻譯則是繼承和借鑒這一傳統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傳統畢竟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思考。對於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或者借助於這一傳統，從我們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和現實生存體驗出發，去進一步反思和發展基督神學，去進一步豐富基督教傳統。願一切有志於此的同道們，共同促進這一偉大的志業。■

李秋零